

唐詩論文集

刘开扬著

I207.2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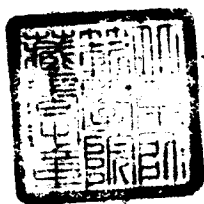
唐诗论文集

刘开扬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35850



上海古籍出版社

735850

唐诗论文集

刘开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0,000

1979 年 9 月第 1 版 197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统一书号：10186·92 定价：1.10 元

自序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前于它的梁陈和后于它的宋明都不能同它相比，人们常常是拿唐诗和《诗经》、《楚辞》相提并论的。唐诗是《诗经》和《楚辞》的进一步发展，它为我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局面。

唐朝共二百九十年，从公元六一八年起，到公元九〇七年止。其间出现了难以数计的诗作者。士人、官吏、将士、释道、妇女以及农民起义参加者都写下了可观的诗篇。江湖、边塞、战场、闺阁、庙宇、官署、山林、旅途、客舍到处都有吟咏的声音。这些诗的体例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有古诗、乐府、歌行、绝句、律诗。有很多诗不仅广泛流传于国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区域，连日本、朝鲜、越南都曾受其影响。在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用十多种文字出版了唐诗集和唐诗研究的著作。

唐朝的诗人和诗篇太致有多少，是难以估计的。《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和总集类所录只是一些较著名的书。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录诗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因系诗话性质，只录名篇。赵孟奎《分类唐歌诗》序言凡录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诗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一首，可说是第一部较象样的唐诗总集。此书未见著录，收藏家也极少，到明朝时仅残存二十七卷，清人吴騄只见过十册（见所著《拜经楼诗话》）。明人高棅所编《唐诗品汇》只有六百多家，诗五千七百多首。黄德水、吴琬所编《唐诗纪》非全唐诗，只收初、盛唐。胡震亨所编《唐音统签》也没有完全刊行。钱谦益、季振宜都有志于编辑全唐诗，用力不少。到清朝康熙时，《全唐

诗》才以“御定”的名义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全书凡九百卷，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作者共二千二百余人。但仍然并非真正的“全”唐诗，恐怕连一半也未到。如《新唐书·艺文志》载，刘希夷集十卷，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今存的诗都不过几十首，即以胡震亨说的文笔四占其三、诗占其一说，也是散佚不少的。而在当时出于民间没有成集的诗自然更多，胡氏没有考虑及此，所以他说：“余以千卷签唐音，在亡之诗，其犹幸相半也乎！”（《唐音癸签》卷三十）

王重民同志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编辑《补全唐诗》，凡遇到敦煌遗书内的残诗卷，都录出不见于《全唐诗》的作品，至一九五四年编成初稿，一九六三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计补出的诗凡九十七首，又残者三首，附者四首，共一百〇四首。这些诗的作者中，有十九人为《全唐诗》所未载。迄今为止，《全唐诗》加上《补全唐诗》，所收作品已达四万九千余首。别的杂书中也应有佚诗，散在国外的钞卷也有待于收集。惜重民同志已作古，未能加以辑出。闻孙望同志《全唐诗补逸》，收诗较多，尚未见。

唐朝诗歌的发达不仅表现在诗人和诗篇的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人中有很多大家和名家，象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储光羲、韦应物、李颀、李白、杜甫、刘长卿、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罗隐、韦庄等人，他们写下了很多卓越的甚至不朽的作品。别的诗人和无名氏也写过一些优美可诵的名篇。真是姹紫嫣红，百花争艳。

《全唐诗》序说：“诗盈数万，格调各殊，……精思独悟，不屑为苟同。”这几句话是说得不错的。胡应麟说，其格有高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之分；其调有飘逸、雄浑、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之分（《诗薮》外编卷三）。那是决定于

各个诗人的思想认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态度以及文学修养等等。由于他们“不屑为苟同”，“甚者宁为幽僻奇满，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而绝不致有蹈袭剽窃之弊”（《全唐诗》序）。当然，卑浅、猥琐和幽僻奇满是不良的文风，然而这在《全唐诗》中所占比重是较小的，它并不是唐诗的主流。

唐诗为什么这样发达？由于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朝封建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继起的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不得不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些改良的措施，这样才出现了初唐和盛唐的经济较为繁荣的局面。国家统一强盛。国内和国际交通便利。文化科学日进。这些都是唐诗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而经济的繁荣则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因素。在上者的倡导，唐王朝以诗赋取士，也有一定影响。而唐朝诗人对于前代诗歌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变革，尤其应该予以重视。以后安史之乱以及延续不已的藩镇之乱，阶级矛盾激化，也可以认为是刺激唐诗创作发达的其它因素。那些认为诗只是抒写性情，而“性情所寄，千载同符”（同上）的看法，实际是抹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和变革的关系，以及所受各时代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罢了。

唐诗是我国重要的文学遗产，它曾经哺育过我国宋元以来一千多年的广大诗作者，更得到过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尤其应该以唐诗中的优秀作品作为借鉴，把诗歌创作更为提高一步，使诗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得更好。我们今天的时代是极其伟大的，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广阔，决不是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所能比拟的。我们必将有一个诗歌的空前灿烂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本书初版于一九六一年六月，收入了我在一九五六年后撰写的论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孟浩然、高适、

岑参、孟郊、李商隐等人的论文七篇。这次重版，增入了论王昌龄、杜甫、柳宗元三个诗人的论文九篇，而以论杜甫的为主。这些文章大多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写的，只有《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补正》、《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和《论柳宗元的诗》三文是近年所作。今后如果健康情况允许，我还将续写论李白、韩愈、贾岛、李贺、白居易等人的论文。

我自幼即是唐诗的爱好者，数十年来诵读、研究不曾少懈，对我慰藉、鼓舞很大，而其中的糟粕也不免对我有所影响。在撰写这些稿件时，观点力求正确，文字也力求通俗易懂，只有《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补正》，因为原作是文言，所以我也用浅近文言写的。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很低，加我才疏学浅，错误一定不少，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九月

目 次

自序	1
论初唐四杰及其诗	1
论孟浩然和他的诗	26
论王昌龄的诗歌创作	38
论高适的诗	52
略谈岑参和他的诗	68
评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3
略论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本原和发展	88
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补正	91
论杜甫的“三吏”、“三别”	110
杜甫在四川的诗歌创作活动	127
杜甫五律例解	159
杜甫两湖晚期诗作述评	177
论孟郊	217
论柳宗元的诗	230
论李商隐的政治诗	261
论李商隐的爱情诗	285

DC36/28

论初唐四杰及其诗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人，大都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们的文艺活动集中于高宗时代，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

四人的生卒年代有确切记载的只有王勃一人，据杨炯《王子安集序》：“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颜氏斯殂。”而王勃在其《春思赋》中则称：“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蒋清翊《王子安集笺注》以为当作二十三。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据王勃集中《三月上巳祓禊序》及《游冀州韩家园序》二文，以为王勃不死于上元三年，永淳二年尚在世，杨炯序是后人所改。蒋清翊则以二文为误收他人之作。至陈氏曲解杨序中“颜氏斯殂”、“贾生终逝”二语，为王勃年三十余之证，尤属牵强附会。二语实只言其短命而死。又陈氏据王勃《上刘右相书》及杨序以麟德元年刘祥道见王勃时勃年十四，但刘为司刑太常伯巡行关内见王勃当在麟德前的龙朔三年（《旧唐书·高宗纪》及《新唐书·刘祥道传》），则麟德元年王勃实不只十四岁。至表荐之事恐在上书祥道之后，杨序行文甚简略。总之，陈氏考证虽辩，实甚疏略不足据。据杨炯序，可见《旧唐书·王勃传》说他死于上元二年和《新唐书》本传说他年二十九都是误记，岑仲勉《唐集质疑》泥于《春思赋》之误及《游山庙序》之举成数称二十岁而不顾杨序之可靠，谓勃生于永徽元年（六五〇年），卒年二十七，也很欠妥。我以为王勃生于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死于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二十八岁。

杨炯卒年不可考，但《旧唐书》本传载他于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年）还向则天献《孟兰盆赋》，他的文集中有《后周明威将军梁公神道碑》，提及梁死于长寿二年（六九三年）二月，其时杨炯还活着，在四杰中恐他死得最晚。又他的文集中有一篇《从弟去盈墓志铭》，记他的弟弟“春秋二十有六，以上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京师”（《盈川集》卷九），可见他的生年当比他的生在公元六五一年的弟弟稍前，和王勃的生年相近。

卢照邻的生卒年代最多异说，有说是六三七年——六九〇年的，有说是六五〇年——六八九年的，不可不略加考证。

按《旧唐书》本传记叙卢照邻的一生道：

（卢）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后疾转笃，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等诵，……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

曹宪是隋朝的秘书学士，又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大师，《旧唐书·儒学列传》载贞观中太宗征宪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太宗读书遇有难字即录以问宪。据此，卢照邻向他学苍雅也应该是去到扬州他的家乡的（卢的《释疾文》说“访旧篆于南越”，当即与此行有关）。王义方则史载他博通五经，高宗显庆末罢官后讲学于昌乐（《旧唐书·忠义列传》），但我认为那时卢照邻已经不止十余岁而是二十余岁（说详下），故我以为他的向王学习，是早年在扬州学完苍雅后北返，到泗州涟水王义方的家乡或洹水王义方的任所去学的（《释疾文》所谓“得遗书于东鲁”，或即与此行有关）。

至于卢照邻的做邓王府典签，应该在此稍后，《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列传》系于贞观二十三年以前，《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则不记年，惟张鷟《朝野僉载》卷六记卢初仕的年岁较明白，他说：

(卢)弱冠，拜邓王府典签。

按卢照邻在六七三年做的《病梨树赋》，序文称“余年垂强仕”（《礼记》：“四十强而仕”），则其弱冠之年当为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左右。张鷟又说：

(邓)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

足见卢照邻做典签还不止一二年。卢的《五悲文》说：

自言少年游宦，来从北燕，淮南芳桂之岭，岷北明珠之川。

邓王曾兼邓、梁、黄、寿、襄五州刺史，与上述区域也相符合。

稍后，是他拜新都尉的时间，可以从他的诗文中约略看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集中《相里夫人檀奁序》称乾封纪岁，当为乾封元年丙寅，《对蜀父老问》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时所作，《病梨树赋》称癸酉之岁卧病长安，则其罢官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计其栖迟一尉，仅五六年。（卷一百四十九）

从乾封元年（六六六年）到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按卢在《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文中称：“法师又于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寝疾之际……”），这段时间可以确定卢照邻是在西蜀的，但是说他栖迟一尉仅五六年则未必然。据《早度分水岭》一诗“丁年游蜀道，斑鬓向长安”看，他应该在高宗显庆年间就去到西蜀了。《全唐诗》称丁年一作千年，斑鬓一作万里，“千年游蜀道”是不可解的，除非是“十年游蜀道”之误，但不管怎样，卢照邻在西蜀是不止住过五六年的。

需要附带说明，闻一多在《四杰》一文（《闻一多全集》第三册）中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载显庆三年（闻氏误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洗等向太白山人孙思邈执师贄之礼一事（《谭宾录》同，见《太平广记》卷二百十八），是显然错误的。《旧唐书·方伎列传》这样记载：

太宗即位，召（孙思邈）诣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

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贄之礼以事焉。

《新唐书·隐逸列传》所载除显庆四年作显庆中以外（可能三年召征，四年召见），其余完全相同，《大唐新语》卷十只记卢向孙学习为高宗时事，没有记年，新旧《唐书》的这个记载是比较确切可靠的（并参《册府元龟》卷八五九）。上元元年（六七四年）岁次为甲戌，与《病梨树赋》所称癸酉岁相接，或者卢照邻第一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颇有可能（《仙传拾遗》即系此事于上元元年，见《太平广记》卷二十一）。只是孙的寓居鄱阳公主邑司是在咸亨四年而不是在上元元年（卢照邻《病梨树赋》序里说：“癸酉之岁，余卧病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谭宾录》系于显庆三年下，尤为疏漏），新旧《唐书》等所记自不如卢照邻所记为可靠。

《唐会要》所称显庆三年卢向孙学习，我以为有不合者二：（一）卢照邻《释疾文》自叙说：“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显庆三年（六五八年）卢仅二十余岁，怎么能说“晚受乎老庄”呢？（二）如果承认卢向孙学习是在他离蜀以后（参看《病梨树赋》序、《大唐新语》卷十和孙思邈传便知），则显庆三年王勃仅十岁，而卢照邻前此在蜀中与王勃游玄武山赋诗时，杨炯《王子安集序》记于十四岁以后，王勃《入蜀纪行诗序》并明说：“总章二年（六六九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安景观物于蜀，……迨弥月而臻焉。”《游山庙序》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粤以胜友良暇，相与游于玄武西山庙，盖蜀郡三灵峰也。”这年代就是显然不相合的。

《朝野僉载》还说：“（照邻）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蜀中，放旷诗酒。”（卷六）说明卢照邻还不是一罢官就离开西蜀的。总计他在蜀应有十几年之久。从他的《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看，

他中间还回过长安一次：《对蜀父老问》说：

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余载（自六一八年——六六九年），月竈来庭，风丘款塞，……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学，四十而无闻焉。

自然，“四十而无闻”是《论语》里的一句陈言，不能说写这样的文章时卢照邻正好是四十岁，但我以为总得在三十五岁以上才好这样说的（正如“十五而志于学”也是用《论语》里的话，但他志学总应在十岁以后）。还可证以上面提到的他在六七三年所作《病梨树赋》序文说的：“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如定六六九年为三十五岁，则六七三年恰为三十九岁，与“年垂强仕”也相合。由此我推定卢照邻当生于六三五年。如有人说的六三七年生，则六七三年他三十七岁，还可说是“年垂强仕”，六六九年却只有三十三岁，怎么好说“四十而无闻”呢？

卢照邻的死更是一个问题，《旧唐书》本传说他死时年四十，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既已指明他在六六九年已经三十五岁，而他在《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里说：“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凋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如自咸亨元年（六七〇年）起算，则八年后为仪凤三年（六七八年），卢照邻尚在人间。《释疾文》序又说：“余羸疾不起，行已十年。”说明此文之作为更后。文中还说：“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这所谓“今上”，即令不是《新唐书》本传所认为的是武后，也应该是中宗或睿宗，六八四年中宗在位仅一月，是谈不上好法不好法的，最少睿宗文明元年（六八四年）卢照邻还一息尚存，吟吐着他的绝命之辞，那时他已是五十以上的人了。陈熙晋以《释疾文》说的“其后登封礼日”云云，是说的武后万岁元年封嵩山，但我以为那是麟德中登封泰山，“蒲帛之书”云云可参《册府元龟》卷三十六，而陈氏之说似无可证。更重要的，是卢照邻自称其时“卧疾十年”，而万岁中上距咸亨四年已二十余年了。

骆宾王的生卒年代也是没有记载的，甚至连他是否被杀都有不同的说法，《旧唐书》本传说他参与了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斗争，“兵败被诛”，《新唐书·李勣传》附《徐敬业传》载敬业与宾王等失败后逃至海边，被徐的部将王那相所斩，凡二十五首，应包括宾王在内，《骆宾王传》却又说他是“不知所之”。此外甚至还有“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朝野金载》卷一）为应其《帝京篇》，“须臾失浪委泥沙”之谶的说法，以及后来宋之问和他见面续诗而宋不相识，敬业和宾王都逃亡为僧病死等等的传说（孟棻《本事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宾王集乃古本，此诗录入则可证其为实）；但为僧之说是不可靠的，宋之问和骆宾王是相好的朋友，绝不会见面而不认识，如果他和徐敬业未死，则天未必不加搜捕，她曾怒斫敬业祖父徐勣的棺木，且罗织甚广，可以看出她对那些“叛逆”者的态度。因此，说宾王兵败被杀或败后投江而死是比较可信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宾王反诛。”考异：“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求降，余党赴水死。今从《实录》、《唐统纪》。”并参《唐音癸签》卷二十九）。

《唐语林》卷二还有如下的记载：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书檄，皆宾王之词也。

如果真的在光宅元年（六八四年）徐敬业起事时骆宾王才二十岁，则他比王勃、杨炯的出生为晚了。这不仅和新旧《唐书》本传所述曾做道王府属、武功主簿，数上书言事，除临海丞，又弃官去到扬州的骆宾王应有的年岁不相合；就从骆宾王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世的年岁是比较大的，如《与亲情书》说：“某初至乡关，言寻旧友，耆年者化为异物，少壮者咸为老翁，……询问子侄，彼亦凋零。”（卷七）《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说：“某散材易朽，……老不晓事，有类扬雄。”（卷六）古人不到接近五十岁，习惯上是不说老

的，而这两篇东西又显然是在光宅元年徐敬业败死以前写的，所以《唐语林》的记载无疑是错误的，骆宾王的生年我推定最少应在此四十六、七年前，即公元六三八年左右（骆宾王在咸亨初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诗：“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可为一证）。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卢照邻年龄最长，其次是骆宾王，两人都比王、杨大十多岁。闻一多除了根据这点（他认为卢骆平均比王杨大十岁左右），还指出王杨和卢骆的性格、友情、作风上的某些不同，认为他们应该属于两个集团。他说：“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又说：“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四杰》，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册二三、二九页）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可是不管当初评文的人是怎样想法，事实上“四杰”的称号能在文学史上成立，并为广大读者所同意，我以为首先是因为他们在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了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的倾向。

杨炯称赞王勃说：

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年（六六一年左右）的“文场变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旧唐书·上官仪传》说：

上官仪，本陕州陕人也。……举进士，太宗闻其名，召授弘文馆学士，累迁秘书郎。时太宗雅好属文，每遣仪视草，又多令继和，凡有宴集，仪尝预焉。高宗嗣位，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兼弘文馆学士如故。本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颇有学其体者，

时人谓之上官体。

这“绮错婉媚”的评语是下得很恰当的，和杨炯说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是一致的。这是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成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又开始以单纯追求技巧的内容贫乏的作品来点缀他们安富尊荣的剥削生活，粉饰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诗苑类格》载他所说“诗有六对”：

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又有八对之说，分析诗的对偶也是极为细密的。这些关于对偶的研究对律诗的创作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他把诗的创作局限在这些上面，就是异常错误的了。《全唐诗》卷二所收上官仪的诗共二十首，那些应制诗实不足取，如《早春桂林殿应诏》：

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暖将夕。

“婉媚”倒是“婉媚”极了，可是他所描写的景物和他的感情都不会被人民接受的，是和人民离得很远的。他的诗和那些模仿者的诗虽然大多是失传了，但《全唐诗》所收刘祎之、元万顷以下所做《奉和太子纳妃太平公主出降》一类的诗也看得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的。上官仪的孙女儿上官婉儿也以诗文得武后的重用，中宗时进拜昭容，与诸学士赋诗唱和，“作辞甚绮丽”（《旧唐书·后妃列传》），沈佺期、宋之问的作品也多经婉儿评定，他们也是受了上官体的一些影响的。

从杨炯的话证明，王勃和杨炯他们是有意识地和王勃作对的。而且杨炯还接着说：“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按卢照邻所称赞的是“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词为贵”（《驸马都尉乔君集序》），这可以看出他的文风的倾向。我以为他最初可能对王勃有意见（王勃诗中也略有绮婉

之作)，但在龙朔以后看到王勃的反对上官体，便停止对王勃的攻击了。王杨卢骆四杰的称号应该出现在这一时期（《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行俭在吏部时，李敬玄盛称四人之才，引见行俭，又载行俭任吏部侍郎在麟德二年，紧接龙朔后，这里可以窥见四杰称号出现的时期）。闻氏只看见他们的始异，忽略了他们的终同。虽然他也提到“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可是他把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浪漫、遭遇悲惨等诗人的才行际运和他们的作品的作用纠缠在一起来考察了，主要的东西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他自然最多只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接受”这个称号了。实际上，闻氏仍然是倾向于把他们拆散开来的。我不赞成废弃四杰这个称号，是觉得不必也不能废弃它的。

闻氏要根据年龄来拆散四杰，那么孟浩然比王维长十岁，我们不能称为王孟；李白长杜甫十一岁，我们不能称为李杜；孔融长王粲二十余岁，更不能同列入建安七子了……。闻氏说王杨和卢骆的性格不同，系据裴行俭所称“炯颇沉默”（《新唐书·裴传》）之语，其实那正是裴拿来和“勃等……浮躁衒露”比较说的。（王勃杀官奴，炯为官严酷，吏稍忤意，即榜杀之。还不浮躁吗？从《朝野金载》、《唐才子传》说杨炯“恃才凭傲”和他呼朝士为驴扮麒麟的“麒麟楮”一事看来，他也不见得会是怎样沉默而不“浮躁”啊。）闻氏又拿王勃著述之多来反证其不会浮躁到那样去，然而著述生涯并不一定能使人沉默下来，毋宁说常常是适得其反的。谈到友情，卢骆并未互相唱和，仅骆有《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诗，也不能证明其交情如何，反之，《朝野金载》倒载有卢照邻说过“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的话；王杨虽有杨的《王子安集序》所说“盖以投分相期”和一些称赞王勃的话，但那文章是在王死后做的，封建时代的文人在人死后即使对他还有个人意见一般也不再谈，而在生前，他倒是说过“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旧唐书·本